

明代浙江地区的诗话创作

谢 群

摘 要：《全明诗话》著录浙江籍诗话家 19 人。其诗话作品形式多样，专门化程度超越了传统诗话创作的范畴；其主要论题是推尊唐诗，宣扬复古思想；在内容上对浙江一地的诗歌创作情况多有评述，是明代浙江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体现。

关键词：浙江；诗话；专门化；复古
作者简介：谢群，女，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4）05-0091-05

诗话纪录诗人遗闻轶事，品评诗人创作得失，探讨诗歌创作规律，是中国古代尤其宋代以后最主要的诗歌评论方式。诗话自欧阳修创始以来，兴盛于宋，经过元代的短暂低回，至明代再现生机。据今人周维德先生集校的《全明诗话》收录统计，“《四库全书·诗文评》著录三十七种，《明史·艺文志》著录三十八种，《中国丛书总录》著录五十七种，以上三种书目，除去同书名者外，共九十八种。”这 98 种诗话典籍，计作者约七十余人。其中，浙江籍贯的作者 19 人，位列各省之冠。从整理情况来看，明代诗话家中可以确证的浙籍人士中，有 5 人中进士之后为官他乡，大多数人治学乡里。从地域来看，又大都生活在杭嘉湖平原一带。

据周维德先生集校的《全明诗话》，浙籍诗话家所创作的明代诗话作品计有 22 部。概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类别	籍贯	作（编）者	诗话作品	内 容
传统类	钱塘	瞿佑	《归田诗话》	评论唐宋元明各代诗歌，勘误、议论时事、叙述典故兼而有之，对自己以及亲友乡人的作品亦有涉及
	鄞县	陈沂	《拘虚诗谈》	主要评论先秦至时期各代名家诗歌
	海盐	徐泰	《诗谈》	仿效《诗品》而作，评论当世诗人，不少为浙地诗人
	钱塘	田艺衡	《香宇诗谈》	主要评论汉至唐名家诗歌
	嘉禾	怀悦	《诗家一指》	总论诗歌创作规律、方法以及风格
	海盐	王文禄	《诗的》	以历代名家诗歌为例阐述诗法
	吴兴	茅一相	《欣赏诗法》	以历代名家诗歌为例谈论诗歌的欣赏方法
	嘉兴	李日华	《恬致堂诗话》	主要评论历代涉及书画的诗歌，以及自己和友人的题画诗
	武林	张蔚然	《西园诗尘》	颇短。讨论各种诗歌体裁的创作方法
	兰溪	胡应麟	《少室山房诗评》	以品评洪武至嘉靖间诗派、诗人、诗作为主
			《诗数》	内编是分体总论，外编（包括杂编与续编）则是自周至明，依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

类别	籍贯	作（编）者	诗话作品	内 容
传统类	海盐	胡震亨	《唐音癸签》	辑录有关唐诗的研究资料，亦有自己对唐人创作的评论
	衢县	叶秉敬	《敬君诗话》	颇短，四五则而已，对某些作品提出批评
	嘉兴	陈懋仁	《藕居士诗话》	叙述与诗友的交游唱和；考证诗句的出处；品评作家作品
	桐乡	陆时雍	《诗镜总论》	评述诗歌发展史，总结历代诗风与诗人创作得失
诗法诗格类	嘉禾	怀悦	《诗法源流》	汇编元代以来诗格诗法类著作
	嘉兴	周履靖	《骚坛秘语》	摘取皎然以来各家诗话汇编而成的诗格诗法类著作
	四明	张懋贤	《诗源撮要》	据《诗法源流》本编录
博闻杂论类	仁和	姜南	《蓉塘诗话》	内容颇杂，无事不录，有些并不涉及诗文创作。对浙江一地诗人的创作亦有评论
	海宁	谈迁	《枣林艺策》	博闻杂论，多记文物典故、文人轶事，不专论诗
选本辩疑类	乐清	朱谏	《李诗辩疑》	评论对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辨李白诗歌 216 首，以此为创作范本
单一考证类	钱塘	田艺衡	《阳关三叠图谱》	以王维《渭城曲》为论题，对各朝代相关诗歌中所涉曲目以及《渭城曲》的演变进行梳理

作为整体研究的明代浙籍诗话家研究至目前为止仍是一片空白。梳理明代浙江地区诗话家的创作情况，探究其主要诗学思想，有助于了解明代浙地的文化发展状况、文学创作思潮，促进明代诗话的深入研究。细读其诗话创作，可以看出，这些浙籍诗话家在诗学思想上有某些共通之处，是明代浙江一地尤其是杭州、嘉兴地区诗坛创作思潮的反映，也对清代诗话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形式多样化，渐成专门之学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本是评论诗人诗派，品评诗歌以及纪录诗人本事的著作。入宋之后，学者重视诗法辨析，故晚唐以来众多的诗法诗格类作品也被纳入诗话范畴。宋人许顗《彦周诗话》曾下定义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迄至明初，诗话基本上处于随笔、散论、品评、纪事性质的发展状态。进入明代中期以后，如郭绍虞先生所称：“如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等，就不是‘以资闲谈’的小品，而成为论文谈艺的严肃著作了。”^[1]胡应麟的《诗薮》分内外编，内编分古体杂言、古体五言、古体七言、近体五言、近体七言和近体绝句六种体式总评历代诗歌，外编（包括杂编与续编）则是自周（先秦）至嘉靖，依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这种颇具系统的诗学论著较之前代显然是不小的进步。即便是与同时期的《谈艺录》、《艺苑卮言》先比，也有人认为“盖将轶《谈艺》，衍《卮言》，廓虚心，采独见，凡诸毫倪妍丑，无不镜诸灵台。”^{[2]（2483）}事实上，以上所列 22 部作品中，有不少像《诗薮》那样已经跳出了传统诗话的范畴，为清代诗话的发展提供了可贵借鉴。

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便被认为是体系严密之作。胡震亨晚归海盐，倾毕生精力完成巨卷《唐音统签》，其中诗话集“癸签”分 7 目辑录有关唐诗的研究资料，诗体、诗格、诗法、诗评、训释、考证、乐通等等无一不备，材料之丰富、体系之严密，论述之严谨，于当时为罕见。茅一相《欣赏诗法》的评论角度颇具特色。历来诗话者虽然重视品评议论，但其出发点往往是析其作法，如序作者王逸民所言，大都“不解赏也。……及泛滥如宋人诗话，则未尝不掩口胡卢也。如严沧浪者，盖十不得一焉。始益知作法之

难，而赏者尤寥寥矣。”^[2](2113)]《欣赏诗法》的产生，正在于作者看到了培养诗人鉴赏能力的重要性，认为应从鉴赏的角度集合古今诸家诗论，对创作进行指导。如周维德先生所言，“欣赏诗法是诗话的一种新形式，是创体。”^[2(37)]此外，还有李日华的《恬致堂诗话》专论题画诗，他能从自身实践出发，从绘画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谈及自己或友人题画诗创作的同时，他还会将创作时的即情即景描绘出来，文笔优美，令人赏心悦目。这样的诗话，既不同于“以资闲谈”的散漫，也不同于钻研诗法类的严肃，自有一种情趣。

周维德先生在总结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时，曾说明人“写作诗话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或为创作，或为复古，或为纠谬，所以创作的态度一般都比较严肃。”^[3]这种针对性的创作态度在乐清朱谏的《李诗辩疑》、杭州田艺衡的《阳关三叠图谱》中尤为突出。朱谏的《李诗辩疑》专评李白，它不是简单地对李诗加以评论。朱谏以为，世传之李诗有诸多谬误，在评诗之前应先选诗，先辨真伪，凡疑者不入选，然后再辩其高下。朱谏辨李白诗，以格调入手，体现了明代标榜高古格调的诗坛风气。田艺衡的《阳关三叠图谱》将王维《渭城曲》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进行了梳理，近似专题论文。

至于姜南的《蓉塘诗话》、谈迁的《枣林艺箴》这类博闻杂论类的作品则为明清诗话的发展提供了除了专门化、体系化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姜南友人陆深在《蓉塘诗话跋》中说：“诗话，文章家之一体，莫盛于宋贤经术，事本国体，世风兼载，不但论诗而已。下至俚俗歌谣，星历医卜，无事不录。至其甚者，虽嘲谑鬼怪淫秽蔽褻之事皆有。盖立言者，用以讳避陈讦，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乃若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顾有裨于正传之缺失，盖史家流也。”陆深这段话的重点在于他突出了诗话的经世作用。“古称文章止于润身，而学以经世为大”，既然诗话为文章之一体，学问的一种，那么诗话的功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论诗本身。《蓉塘诗话》“是集所录”，正是“经世之端盖多矣”。当然，在明清呼名为“诗话”的典籍中，此类颇少。

二、宗唐推李杜，显露复古思想

从明代前期瞿佑的《归田诗话》到晚期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这些诗话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批评倾向，那就是宗唐。事实上，“宗唐”不仅仅是这些诗话典籍的共同观点，也是当时元末以来明人的一贯认识。瞿佑在《鼓吹续音》序言篇就称：“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当时的宗唐思潮，在浙江诗话领域中有充分反映，这些诗话典籍或在议论中阐述对唐诗的看法，或直接以唐诗、李杜为研究对象，充分体现了对唐诗的重视程度。如胡震亨作《唐音癸签》，明显要“唐诗作一个全面地评价和总结”，“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几乎包括全部唐诗的总集”。^[4]

不过，在取法唐诗，以谁为师的具体问题上，各家又有不同的看法。释怀悦《诗家一指》以为：“楚汉、魏晋、盛唐之作，斯禅宗最上乘。大历以还，已落二义，晚唐则声闻辟友。”陈沂《拘虚诗谈》也认为“大历以后，诗为羽翼”，“晚唐杜牧、李商隐等，虽是名家，但声气衰弱，句意尖巧，吟咏无余味，赏鉴无警拔，与大历不可同日语也。”他所推举的师法对象均不晚于盛唐：五七言绝句、七言长歌以李白为祖，五言古以汉魏为宗，五言排律应在开元以前，七言律宗于杜甫，四言咏味《风》《雅》，长辞咏味楚骚，近体必宗开元以前。这种倾向实际上与后来前后七子的主张是一致的，“全盘否定东汉以后的散文、魏晋以后的古诗和盛唐以后的近体诗”，^[5]可视为复古主义之先声。也有持异议者。如张蔚然的《西园诗尘》虽也宗盛唐，言“初唐有篇无句，晚唐有句无篇，初唐有骨无声，晚唐有声无骨，而以盛唐为神明。”但他也以为“世动称不作大历以后语，则晚可废乎？”陆时雍的《诗镜总论》大半篇幅品评唐诗，以为在律诗一体上，唐代诗人各有千秋，不必纯然以盛唐为尊。他说：“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初唐人承隋之余，前华已谢，後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撝意而取精，选言而

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

在具体的诗法对象上,各家又多以李杜为尊。尊李者如朱谏,称李白“才由天授,气雄万夫,胆略疏阔,迥出尘表”,“在当时,无有不知李白,而愿睹其眉宇者,虽杜子美、韩退之之贤且才者,亦相推而相逊焉。”[2]⁽⁵²⁷⁾尊杜者如怀悦、周履靖、张懋贤等人,以杜甫诗集为底本,汇编历代评析杜诗之句法、字法和章法,释怀悦所编的《诗法源流·诗格》收杜诗四十三首,每一诗著一体格,据称为杜甫九世孙杜举所传,编者奉为主臬。当然,在诗论中李杜同推者也比比皆是,如瞿佑《归田诗话》即云:“杜识大体,李有胸次”。对于精研李杜诗法的诗话家来说,指摘李杜诗作中的瑕疵,也是其诗话中的重要内容。朱谏的《李诗辩疑》将李白作品中语意平平者摘出,以为“未足深以为法”。王文禄在《诗的》中说:“杜诗中凡称令弟、令兄、先生、郑公、大夫、主人、宫主、驸马、老夫、公子,皆俚语,切不可效之入诗中。”陆时雍《诗镜总论》虽对李杜尤其是李白极其推崇,但认为巨擘如李杜,在古诗创作上亦未如汉魏完美,李诗病在“太利”,而杜诗病在“好奇”。

总体来说,浙籍诗话家在诗话典籍中较少谈及宋元诗作,虽然师法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宗唐”的总体倾向并没有偏离,在古体诗的创作上,其师法推崇的对象也大致以汉魏为主。这样的诗学思想应该说与影响明代诗坛上百年的复古思想是一致的,是当时诗坛创作主张的反映,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诗坛的创作。

三、立足于本朝,评述浙人创作

对于浙籍诗话家来说,在诗话作品中品评时代作家尤其是本地浙人的诗歌创作,录其创作轶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明代前期瞿佑的《归田诗话》记载了大量浙籍诗人或在浙诗人的创作,粗略计算,有十七八家之多,其中有元末明初会稽籍名家杨维桢以及浙省员外张光弼。瞿佑的叔祖瞿士衡与杨维桢交好,常与其唱和,瞿佑虽年少,因有诗才,也被杨维桢所熟知。《归田诗话》记载:杨维桢晚年尝以《香奁八题》见示,而瞿佑依其体,作8首呈上,杨维桢对此大加赞赏,对瞿士衡说:“此君家千里驹也。”又以“鞋”、“杯”命题,瞿佑又写了一首《沁园春》以呈,如此诗才,杨维桢即命侍妓歌以行酒,后袖其稿而去。此事清代吴景旭《历代诗话》卷73亦有记载。从瞿佑对杨维桢多次创作经历的叙述和评价可以看出,杨维桢是个行为放达、随心所欲的诗人。他经常往来沪杭,好携妓同游,结社唱和,对浙江诗坛有较深的影响。如他倡作《西湖竹枝词》,吟咏湖山人物之美,寓情于中,和者众多,以至后来以西湖为题的竹枝词创作成为一种时尚。《归田诗话》总结杨维桢的创作时说,杨诗“皆言宴赏游乐之意,亦其平生性格所好也。”从瞿佑的记载来看,杭州人对张光弼的创作亦非常推崇,张诗虽尽显富贵华侈,却“多为杭人传诵”,可见当时杭州诗坛之风气。

弘治年间,杭州(仁和)人姜南的《蓉塘诗话》对浙地诗人也做了不少评介。姜南重经世道德之学,所录诗歌多内容端正,品评诗歌亦主儒家之温柔敦厚,如评其乡人胡端敏之诗“浑厚庄重”,评嘉兴诗人李孟昭的《西湖夜宿》“蕴藉可爱”,认为嘉兴诗人陈汉昭的《题枇杷山鸟图》有怨刺之意,“辞虽隐而意愈露”。姜南对杭州诗人颇为爱护,往往不吝赞美之辞。如成化年间钱塘诗人平显的《题黄鹤山人王叔明画》,姜南推崇备至,称“其诗既洒脱,亦吾杭之诗豪也。”他还评论仁和人沈明德的《咏蟹》诗“豪俊可爱”,语气颇为亲切。

此间的另一位诗话家海盐人徐泰对整个浙江诗坛作了自己的评判,地域涉及金华、吉安、会稽、嘉禾、钱塘、海盐等地,人数有30人之多,并俱褒以为“名家”。他自豪地说:“本朝作者,莫盛东南,姑苏为最,云间、晋陵、嘉湖其次。”[2]⁽¹²⁰⁷⁾他把浙江诗坛的彬彬济济部分归因于“地灵”,同时又说:“虽曰地灵,亦气运使然乎”,“我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偶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他认为,正是弘治年间诗歌创作之风炽热,加上杭嘉湖平原一带浓郁

的人文气氛，造就了当时浙江诗坛人才辈出的盛况。但这种诗坛人才辈出的大好景象在明代晚期的诗话典籍中并没有得到明显体现。倒是谈迁《枣林艺笈》记载了武康人吴允兆、永嘉何无咎争诗一事，谈迁借余杭徐茂吴之口以嘲讽的口吻批评道：“句未佳，何争为”，点出了当时浙江诗坛场面热闹但佳作寥寥的实质。

从宋代以来诗话的发展历程来看，明代浙江诗话家的创作表现相当突出。在诗话繁盛的宋代，笔者据《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宋诗话辑佚》统计，浙江籍贯的作者只有钱塘强幼安一人而已。而据《全明诗话》的收录，浙江籍贯的作者有19人之多，位列各省之冠。发展之迅速，可见一斑。推其原因，江南一带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对诗话创作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南宋以来，科举文化的长期发展使得江南一带已成人才重镇，整个地区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南宋定都临安，中央教育机构也得以在杭州重建，据史料称，“高宗南渡以来，复建太、武、宗三学于杭都”，^[6]“三学”之外，杭州又有府学以及仁和、钱塘二县学，其他地方亦有县学。县学以下，又有“社学”与私塾。经过长期发达的教育熏陶，至明代，江南已成人才中心。教育的发达对文学的普及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力，读书人纷纷结社，文有文社，诗有诗社，相互唱和，互为吹捧，争相评论。这样一来，以点评和记录为主要功能的诗话作品得以大量产生。在本文列举的浙籍诗话家中，除个别人因生平不详无法考证外，大多数人有功名在身，或为举子，或为进士。像瞿佑、田艺衡为当地国子助教、州学训导，他们对浙江一地的结社创作、唱和交流情况非常敏感，在诗话中多有记录。而胡应麟与李攀龙、王世贞交好，陈懋仁与钟惺、袁宏道交好，其诗话作品亦对当代名家诗论有所呼应。此外，随着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浙江著书刻书藏书之风也日渐盛行，这也影响了诗话的产生。如《骚坛秘语》、《诗源撮要》二部诗话的编次者或审定者周履靖即是明代浙江有名的刻书业者。总之，明代江南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推动了浙江诗话的发展，使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

参考文献：

- [1] 郭绍虞. 清诗话前言 [A]. 丁福保. 清诗话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
- [2] 周维德. 全明诗话 [Z]. 济南：齐鲁书社，2005.
- [3] 周维德. 论明代诗话的发展与专门化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55-63.
- [4] 金开诚，葛兆光. 古诗文要籍叙录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557.
- [5] 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
- [6] 吴自牧. 梦梁录 [A].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Z].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54.